

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资本的 阶层差异^{*}

张文宏

提要: 本文采取了在社会网络领域长久被忽视的阶层分析的视角研究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结构特征。通过对2000年北京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调查资料的定量分析,我们发现,阶层地位对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资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网络规模大于工人阶层,前者的关系种类比后者更多元化。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比工人阶层拥有更明显的“结构洞”社会资本,前两个阶层与网络成员的交往频率低于后者。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社会网络在性别、年龄和职业异质性方面高于工人阶层。总之,占据高阶层位置的专业行政管理人员比工人拥有更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本。社会网络结构特征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工人阶层之间,可能与中国的阶层结构的不充分分化有关。

关键词: 阶层地位 阶层差异 社会网络资本

一、研究问题与文献评述

本文的中心主题是分析当代中国城市各阶层的社会网络资本,研究阶层地位对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结构特征的可能影响。本研究将涉及以下具体问题:不同阶层的成员在社会网络的规模、关系种类、交往频率和异质性等网络结构特征方面是否存在差别?如果存在,那么,造

* 本文根据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完成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改写而成。该成果是李沛良教授主持的《香港和北京社会网络与健康比较研究》项目(受香港特别行政区研究资助局资助,编号为CUHK4135/99H)的一部分。感谢李沛良教授以及项目参与者陈膺强教授、彭玉生博士、赖蕴宽博士、阮丹青博士为本项目做出的贡献。北京的抽样调查和入户访问由林彬、刘德寰与郝大海等负责。感谢岭南基金会杨庆堃研究生奖学金、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巴尼校区 Lewis Mumford 比较都市与区域研究中心和上海市教委社会学 E 研究院(上海大学)对作者提供的研究资助。本文的修改正值作者在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从事博士后期间,感谢边燕杰教授的实质性资助和建设性意见。吕大乐、彭玉生等教授对本文的修改提出了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将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结构的机会与限制理论，解释阶层地位对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结构特征的可能作用。

也许与社会网络分析者所倡导的“反对类别分析”的坚定立场有关(Wellman, 1988; Scott, 2000)，也许与阶级阶层研究者忽视社会网络分析者的研究成果相联系，从阶级阶层的视角分析人们的社会网络结构，或从社会网络的角度研究社会分层的成果并不多见。在西方社会学家的几项相关研究中，多数研究者将朋友网络作为其焦点。例如戈德索普(Goldthorpe, 1987: 152—182)对1972年英国社会流动调查资料的分析发现，亲属在工人阶级的交往模式中发挥着比在高级专业行政管理人员中更大的作用；在休闲网络的规模方面，各阶级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异；虽然各阶级的朋友规模存在着明显差别，但是与朋友的关系维持时间则基本一致。在休闲网络中，工人阶级的网络成员之间彼此认识的比例高于高级专业行政管理人员(前者为77%，后者仅为35%)；但是，在朋友网络中，成员之间彼此认识的比例却恰好相反(高级专业行政管理人员的比例是39%，工人阶级是17%)。因此，在选择休闲伙伴和维持朋友关系两个方面，工人阶级不可能建立更广泛的、更松散的联系网络(Goldthorpe, 1987: 180—184)。万·德·普尔(Ven der Poel, 1993: 71)对荷兰社会支持网的研究发现，服务阶级(service class)、小业主的网络规模大于常规非体力劳动者和工人阶级，但是各阶级之间在亲属关系比例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别。总之，各阶级之间网络规模的差别主要表现在非亲属关系方面。

在华人社会，熊瑞梅等(熊瑞梅、黄毅志, 1992)较早涉及到阶级阶层对社会网络结构特征的影响这个主题。她们对台湾小资本阶级社会资源状况的研究发现，由雇主和自营业者构成的小资本阶级，在创业时比受雇阶级拥有较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源。

边燕杰及其同事(边燕杰、李煜, 2000)最近运用定位方法(position generator)从社会分层的视角研究了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和关系资本。他们的研究发现，按照网络规模、网络差异和网络密度等指标来测量，具有网络优势的阶层依次是经济专业人员、管理人员、行政文秘人员、私营业主和文化专业人员，没有网络优势的是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和个体户。受赖特(Wright, 1997)影响，边燕杰(2004)在其最新研究中按照产权、管理权和专业技能三个标准将城市居民分为

行政领导、经理、专业技术、办事人员、技术工人、雇主、自雇和非技术工人8个阶层。通过对1999年中国5城市社会网络调查资料的定量分析,他揭示了行政领导、经理和专业技术阶层的社会资本总量高于非技术工人,其次是办事人员和技术工人,社会资本总量最低的是雇主、自雇者和非技术工人。前三个阶层拥有相对优势的社会网络资本。行政领导阶层的网络规模、与领导层、经理层和知识层的纽带关系均明显高于非技术工人阶层。相反,雇主和自雇阶层则缺乏网络优势,虽然他们的网络规模大于非技术工人,但是其网顶低、网差小,尤其缺乏与领导层、经理层和知识层的纽带联系,这是雇主和自雇阶层社会资本总量不高的根本原因。上述结果说明,阶层地位是人与人之间社会资本总量差异的一个关键因素。

综观上述有关阶级阶层与社会网络的理论模型与经验研究,有几个特点,第一,有关阶级阶层对社会网络结构特征影响的发现并不完全一致,有些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第二,多数研究是针对关系较密切的朋友网络进行的。针对网络密度较高和规模较小的朋友网络的研究发现,在以其他提名问题(name generator,如“重要问题讨论网”、“社会支持网”、“信息传播网络”和“求职网”等)等为主题的社会网络研究中,不一定能够得出相似的结论;第三,阶级阶层与个人或家庭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关系是一个受到忽视的重要领域,关于华人社会特别是中国大陆的相关研究尤其如此。

二、研究假设和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概述以往关于个人社会网络研究与阶级阶层地位分析的文献以及上面的研究架构,我们认为,人们的社会网络结构取决于其在社会网络中的结构位置,后者又决定于他们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不同位置。而阶层地位是人们社会经济特征的综合反映,表现为不同阶层的成员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据不同的位置。这些高低不等的阶层结构位置直接影响了社会成员在拥有财富、地位和社会声望等个人资源方面的不平等,后者进而构成了其社会交往的机会或限制,或是成为其社会交往的成本或代价,最终表现为不同阶层的成员在拥有社会资源或社会资

本(亦即本文所研究的社会网络结构特征)方面有一定的差异。故此,我们的中心假设是:占据不同阶层位置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网络结构特征。根据目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不充分分化的现状,我们预测阶层地位对社会网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阶层结构的两极。我们的具体研究假设如下:

1. 社会网络资本的差异性假设

根据社会资本理论(Lin, 1982, 2001),在一个分层的社会结构中,越是位居或接近社会金字塔顶端的社会成员,其控制和涉取社会资源的能力越强。因此,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位居上层的专业行政管理人员将比位居下层的工人拥有较大的网络规模和关系种类。位于中间阶层的普通白领和小雇主则与工人的差别不大。

2. “结构洞”的社会资本及交往频率假设

根据博特的“结构洞”命题,社会网络规模与交往频率呈现负相关关系,与网络中的“结构洞”社会资本正相关(Burt, 2001: 10-14)。因此,我们预测:同工人阶层相比,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的交往频率更低,但是前者网络中陌生成员的规模更小。

3. 网络异质性假设

与假设1相联系,社会网络资本相对丰富的阶层,其网络构成也往往表现出多元化的倾向。因此,我们假定,按照性别、年龄、教育和职业等异质性指标来测量,专业行政管理人员的社会网络资本将比工人阶层更丰富。

(二)资料来源和抽样设计

本文的资料来自2000年7-8月在北京城市地区进行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抽样步骤如下:第一,按照概率比例抽样方法(probabilities proportional to size,简称PPS)从北京市中心和近郊8个区抽取12个街道作为初级抽样单位(PSU)。第二,根据PPS方法从每个被抽中的街道选取4个居民委员会。第三,从被抽中的48个居委会中按照简单随机原则获得1677个住宅地址作为调查样本。第四,从被选中的住宅中按照随机数表选择被访户。在选定的被访户中,由访问员按照基什网格法(Kish Grid)选择合适的被访者,最终成功访问了1004位18岁以上的在职或退休的城市居民。除了年龄分布以外,样本和总体在性别、婚姻状况、教育、职业和工作单位所有制等指标的分布比较接近,说明本

次调查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张文宏等, 2004)。

(三)主要指标的操作化测量

社会网络。北京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调查的提名问题(name generator)直接取自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SS)中的一个问题:“大多数人时常会和其他人讨论重要的问题。在过去半年内,你和谁讨论过对你来说是重要的问题呢?”(Burt, 1984)为了与国内外同类研究进行比较,该调查沿袭了最多提名5名讨论网成员的惯例。除了询问被访者与每个被提名的讨论网成员的关系密切程度、关系类别、认识时间和交往频率以外,还追问了每位讨论网成员的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职业等资料。

1. 依变项:社会网络的结构指标

(1)网络规模(size of network)指的是与自我(ego,即被访者)在过去半年讨论过重要问题的总人数,并不仅仅限于自我所提到的前5个讨论网成员的人数。在进一步的分析中,我们还分别测量了亲属网络的规模和非亲属网络的规模。

(2)与网络规模相关的一个概念是关系种类(numbers of role relationship)。相关的研究从未涉及关系种类的分析,本研究首次对社会网络的关系种类进行了探索。我们首先将角色关系归类为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其他亲属、同事、同学、邻居、好友、普通朋友和其他非亲属11种,然后测量自我提到的关系种类,在计算中排除了关系重迭的个案。我们还进一步测量了亲属关系种类和非亲属关系种类。

(3)陌生成员的规模(numbers of strangers in alters)和交往频率(frequency of contact)。陌生成员的规模用社会网络中彼此之间不认识的成员的总人数来测量。这个指标对博特(Burt, 1992)的“结构洞”概念进行了操作化。交往频率指自我与网络成员讨论重要问题的频繁程度。原始问卷将自我与网络成员的交往频率分为“每日”、“每星期至少一次”、“每月至少一次”和“少于每月一次”,以及“不一定”几个类别。本文的交往频率以自我与网络成员每日交往在整个网络中所占的百分比来测量。

(4)异质性(heterogeneity)指的是一个社会网络中全体成员(不包括自我)在某种社会特征方面的分布状况。性别异质性和职业异质性按照异质性指数(index of qualitative variation,简称IQV)的标准公式计算(Marsden, 1987; 阮丹青等, 1990; Ruan, 1993; 李沛良, 2001: 53)。年龄和

教育异质性由网络成员间的年龄和接受正规教育年限的标准差来表示,标准差越大,说明讨论网成员的异质性越强。在异质性的计算中,排除了网络规模小于2的个案(Marsden, 1987)。

2. 自变项

阶层地位。结合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的阶层分类和社会分层标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结合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人们在正式组织中的权威关系、所掌握的专业技能以及教育获得、收入等指标(Goldthorpe, 1987; Wright, 1997; 陆学艺主编, 2002),笔者初步将中国城市居民划分为专业行政管理人员、小雇主、普通白领和工人4个阶层(张文宏等, 2004)。在938名有效被访者中,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占32.8%,小雇主阶层占3.8%,普通白领阶层占16.1%,工人阶层占47.2%。在回归分析中,将阶层变项编码为4个虚拟变项(dummy variable),以工人阶层作为参考类别。

3. 控制变项

我们在分析中将性别、年龄、婚姻地位作为控制变项,以考察阶层地位对于网络结构特征的独立影响。在其他分析中,研究者有时将网络密度和亲属比例作为依变项(Ruan, 1993: 45—47和表3.6),有时又将其作为控制变项探讨社会人口特征对网络结构指标的独立影响(Marsden, 1987)。为了研究阶层地位对于网络结构特征的独立解释力,我们在量化分析中也将这两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项纳入回归方程。以往的研究发现,社会人口特征(如性别、年龄、婚姻地位等)对人们的社会网络结构会产生不同的影响(Laumann, 1966, 1973; Fischer, 1982; Van der Poel, 1993; Ruan, 1993)。同时,相关研究也表明,网络规模和亲属关系比例对于交往频率、网络密度与网络异质性等网络结构特征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uan, 1993)。因此,为了检验阶层地位对社会网络结构的独特影响,在具体的分析模型里,我们均把性别、年龄、婚姻地位、网络规模、亲属比例等变项作为控制变项引入回归方程。

三、研究结果与发现

(一)网络规模和关系种类

在表1网络规模对社会人口特征和阶层地位的回归分析中,我们

首先将自我的社会人口特征——性别、婚姻状况、年龄^①和亲属关系比例引入回归方程,然后将阶层地位变项引入回归方程,以期发现阶层地位对网络规模影响的独特解释力。另外,由于大约1%的被访者提到了10—50个讨论网成员,为了使各自变项与因变项(网络规模)之间的关系更好地拟合线性分布,我们对网络规模变项经过对数转换以后再引入OLS回归模型(李沛良,2001:262—263)。

从表1模型1的回归分析结果中可以发现,在控制了性别、婚姻状况和年龄以后,阶层地位对于讨论网总体规模的影响仍然相当显著。统计结果显示,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讨论网规模是工人阶层的1.24倍($e^{.217} = 1.24$, $P < .05$),即前者的平均网络规模比后者大24%。白领和小雇主阶层的平均网络规模虽然分别小于和大于工人阶层,但是在统计上并不具有显著的意义。上述结果说明,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平均网络规模显著大于工人阶层。从表1模型2的结果可以发现,虽然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的平均亲属规模大于工人阶层,小雇主的平均亲属规模小于工人阶层,但是这些差异在统计上不显著。这个结果表明,各阶层之间在讨论网的亲属规模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从表1模型3的结果可以看到,专业行政管理阶层讨论网中的非亲属规模比工人阶层多0.298人($P < .05$)。白领阶层和小雇主阶层的非亲属规模虽然小于工人阶层,但是在统计上不具有显著的意义(见表1)。

表1模型4—6关于关系种类回归分析的结果与模型1—3类似。从模型4可以看到,在控制了性别、婚姻状况和年龄以后,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关系种类平均比工人阶层多0.291种($P < .001$),白领阶层平均比工人阶层多0.152种($P < .10$),小雇主阶层平均虽然比工人阶层少0.083种,但是却不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这个结果说明,同工人阶层相比,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讨论网中的关系种类更多元化。模型5的结果显示,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的亲属关系种类多于工人阶层,小雇主阶层的亲属关系种类少于工人阶层,但是这些差异并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意义,说明各阶层在讨论网的关系种类上不存在明显的差别。从模型6的结果可以发现,专业行政管理阶层

^① 在原始的分析中,我们还将年龄平方作为控制变项输入回归方程,结果显示年龄平方对于网络构成的各指标的影响基本上不显著,因此在最终的分析中,我们将年龄平方剔除,以使回归模型更简练。

的非亲属关系种类平均比工人阶层多 0.25 种 ($P < .001$), 白领阶层的非亲属关系种类多于工人阶层, 小雇主阶层的非亲属关系种类少于工人阶层, 但是后两项结果在统计学意义上不显著。这个结果说明, 专业行政管理阶级讨论网中的非亲属关系种类较工人阶层更多元化。表 1 的结果验证了假设 1 的预测。

表 1 网络规模和关系种类的回归分析

	网络规模 (log)	亲属 规模	非亲属 规模	关系 种类	亲属关系 种类	非亲属 关系种类
	(1)	(2)	(3)	(4)	(5)	(6)
男性	-.157 (.093)	-.133 * (.080)	.010 (.107)	-.070 (.065)	-.087! (.063)	.026 (.068)
已婚者 ¹	.220! (.150)	.314 ** (.128)	-.169 (.171)	.179 * (.104)	.360 *** (.100)	-.189 * (.109)
年龄	-.021 (.023)	-.033 * (.020)	.023 (.026)	-.007 (.016)	-.013 (.015)	.008 (.017)
阶层地位 ²						
专业行政管理	.217 * (.105)	.068 (.089)	.298 * (.120)	.291 *** (.073)	.064 (.070)	.250 *** (.076)
普通白领	-.055 (.134)	.112 (.114)	-.028 (.153)	.152! (.093)	.077 (.090)	.077 (.098)
小雇主	.167 (.243)	-.101 (.207)	-.017 (.278)	-.083 (.168)	-.014 (.163)	-.073 (.177)
常数项	1.347 ** (.531)	1.350 ** (.453)	1.617 ** (.607)	2.180 *** (.368)	.797 * (.357)	1.342 *** (.388)
R ²	.015	.024	.019	.029	.022	.035
N	934	935	935	935	935	935

系数为非标准化的回归系数, 括号内为标准误。! $P < .10$, * $P < .05$, ** $P < .01$, *** $P < .001$ (单侧检验)

1. 参考类别为未婚者和离婚、分居及丧偶者。
2. 参考类别为工人阶层。

(二)“结构洞”与交往频率

表 2 模型 1 关于讨论网中陌生成员规模对阶层地位的回归分析结

果显示,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白领阶层和小雇主阶层分别比工人阶层的陌生成员规模多 0.34 人($P < .001$)、0.18 人($P < .10$)和 0.29 人,即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讨论网中陌生成员的规模显著大于工人阶层。该模型的削减误差比例(R^2)达到 12.8%,颇具解释力。

表 2 陌生成员规模和交往频率的回归分析

	陌生成员的规模	每日交往的%
	(1)	(2)
男性	.027(.093)	-.299(.087) ***
已婚者	-.025(.151)	-.063(.141)
年龄	.014(.023)	.016(.021)
网络规模	.120(.017) ***	-.081(.015) ***
亲属比例	-.006(.001) ***	.002(.000) *
阶层地位		
专业行政管理	.344(.105) ***	-.299(.098) **
普通白领	.176(.134) †	-.135(.125) †
小雇主	.295(.239)	.019(.222)
常数项	.148(.530)	.954(.494) *
R^2	.128	.053
N	905	905

系数为非标准化的回归系数,括号内为标准误。

† $P < .10$, * $P < .05$ ** $P < .01$, *** $P < .001$ (单侧检验)

1. 参考类别为未婚者和离婚、分居及丧偶者。

2. 参考类别为工人阶层。

从表 2 模型 2 的统计结果可以发现,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白领阶层与网络成员每日交往的比例分别比工人阶层低 29.9% ($P < .05$) 和 13.5% ($P < .10$)。小雇主与网络成员每日交往的比例虽然比工人阶层高 1.9%,但是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显著(见表 2)。表 3 的两项结果支持了假设 2 的预测(见表 3)。

(三)网络异质性

表 3 模型 1 是阶层地位及社会人口特征对网络成员性别异质性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的性别异质性分别

比工人阶层高 14.4% ($P < .001$) 和 10.1% ($P < .01$)。小雇主阶层虽然比工人阶层的性别异质性高出 0.9 个百分点, 但是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意义。该模型的削减误差比例达到 18.3%, 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 (见表 3)。

表 3 网络异质性的回归分析

	性别	年龄	教育	职业
	(1)	(2)	(3)	(4)
男性	-.035(.028)	.042(.437)	.005(.129) *	-.041(.029) !
已婚者 ¹	.037(.046)	.101(.710)	.094(.207)	-.014(.048)
年龄	-.008(.007)	.017(.108)	.005(.031) *	.004(.007)
网络规模	.016(.005) ***	.280(.077) ***	.110(.023) ***	.026(.005) ***
亲属比例	.004(.000) ***	.097(.005) ***	.013(.002) ***	.00012(.000)
阶层地位 ²				
专业行政管理	.144(.032) ***	.916(.492) *	-.247(.145) *	.072(.033) *
普通白领	.101(.041) **	.759(.631)	.222(.185)	.060(.042) !
小雇主	.009(.073)	-.449(1.146)	-.286(.331)	.104(.075) !
常数项	.347(.162) *	1.575(2.479)	.148(.726)	.435(.167) **
R ²	.183	.303	.130	.059
N	905	896	887	905

系数为非标准化的回归系数, 括号内为标准误。

! $P < .10$, * $P < .05$, ** $P < .01$, *** $P < .001$ (单侧检验)

1. 参考类别为未婚者和离婚、分居及丧偶者。

2. 参考类别为工人阶层。

从表 3 模型 2 的结果可以发现, 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比工人阶层的年龄异质性高 0.92 年 ($P < .05$), 白领阶层比工人阶层的年龄异质性高 0.76 年, 小雇主阶层则比工人阶层的年龄异质性低 0.45 年, 后两项结果在统计学意义上不显著。该结果显示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年龄异质性高于工人阶层。该模型的削减误差比例达 28.9%, 说明该模型的解释力相当强。

表 3 模型 3 的结果表明, 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教育异质性比工人阶层低 0.25 年 ($P < .05$)。白领阶层比工人阶层的教育异质性高 0.22 年, 小雇主阶层比工人阶层的教育异质性低 0.29 年, 但是后两项结果

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显著。该模型的削减误差比例达 13%，说明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

表 3 模型 4 报告的是阶层地位影响职业异质性的回归分析结果。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白领阶层和小雇主阶层的职业异质性分别比工人阶层高 7.2% ($P < .01$)、6% ($P < .10$) 和 10.4% ($P < .10$)。该模型的解释力达到 5.9%。如果按照性别、年龄和职业等指标来测量网络异质性，那么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明显比工人阶层拥有更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本。除教育异质性以外，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性别、年龄和职业异质性指数均高于工人阶层，这个结果基本上证实了假设 3 的预测(见表 3)。

四、结论与讨论

(一)网络规模和关系种类

通过阶层地位影响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规模和关系种类的实证分析，我们的主要发现和结论可以概括为：1. 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网络规模和关系种类、非亲属规模和非亲属关系种类大于工人阶层。2. 各阶层之间在亲属规模、亲属关系种类方面没有显著的差异。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上述结果呢？网络规模在社会网络研究中多次被用作测量人们社会资源或社会资本丰富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以往的研究揭示，无论在工具性网络还是情感性网络中，规模越大预示着社会资本越丰富 (Fischer, 1982; Wellman, 1979; Van der Poel, 1993)。根据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理论 (Blau & Ruau, 1990) 和社会资本理论 (Lin, 1982, 2001)，交往机会受到人们在社会经济等级结构中所占据的高低不同的阶层位置的限制。在我们的分析中，处在较高阶层位置的成员即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成员，由于其在阶层结构的等级制中位居最上层，无论是与相同阶层地位还是较低阶层地位成员的接触机会均明显多于其他阶层的成员。同时，处在上层地位的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成员，由于占据着优势的结构位置，在社会交往中所遇到的障碍或限制相对较少；而处在较低结构位置上的工人阶层，其交往机会少于其他阶层的成员，所受到的限制和约束相对较多。这种交往机会与限制的交互作用，造成占据上层地位的专业行政管理成员同处在较低阶层地位的工人阶层相比，自然拥有较大的网络规模和较多元化的角

色关系种类。

处于中间结构位置的小雇主,是当代中国正处于创业和爬升阶段的一个阶层,他们在当代中国阶层结构中处于一种矛盾的模糊位置,借用赖特(Wright, 1978)的说法,他们处在一种“矛盾的阶级位置”上。同工人阶层相比,他们拥有支配生产资料和雇佣他人劳动的权力。同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相比,他们控制经济资源、文化技术资源和其他社会资源的能力又相对较弱。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他们只能在占据主导地位的大中型国有企业以及享有种种优惠政策的外资企业的夹缝中寻求生存和发展。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小雇主的来源比较复杂,既有原来的农民和城市无业、待业者(包括1980年代中后期返城的原下乡知青),也有改革开放以后下海经商的原国家干部、国有企业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第四次中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资料表明,私营企业主在创办企业前有43.4%是企事业单位干部,17.4%是个体工商户,14.2%是工人和服务业员工,10.5%是专业技术人员,9.3%是农民(张厚义, 2002: 199—247)。他们的工作通常是“全天候”的,其用于社会交往的闲暇时间相对较少。他们的交往范围有可能限于与其有商业关系的相对狭小的圈子内。因此,在讨论对他们而言的重要问题时,很可能提到更少的网络成员和较少的关系种类。这个发现与边燕杰用定位法研究中国城市家庭社会网络资本的结论类似(边燕杰、李煜, 2000; Bian, 2001),但是与熊瑞梅关于台湾小资本阶层之社会资源研究的发现正好相反(熊瑞梅、黄毅志, 1992)。^①

网络的总体规模从一个方面测量了一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或社会资本的丰富程度。传统的社会网络研究还将网络规模分解为非亲属规模和亲属规模两部分,进一步分析个人或群体在这两种网络子规模方面的差异。按照关系的来源划分,非亲属关系是一种获致性关系,是通过自己后天的努力和投资(包括时间、金钱和感情的投入)而形成和维持的。亲属关系则是先赋性的关系,主要是通过血缘纽带而产生和维持的。阶层地位的差异必然影响人们与不同角色关系的网络成员的

^① 造成这个差异的可能原因有二:第一,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化历史的差异。台湾私有企业的发展至少有40年的历史(截止调查进行时),而大陆私营企业的发展仅有20年的历史。第二,测量方法的差异。熊测量亲密网络的提问是“最近半年内您与谁曾经发生过抒情(诉苦、告知重大私事)行动?”北京项目所使用的提名问题是“在过去半年,您与谁讨论过对您来说重要的问题?”使用不同的提名问题,可能导致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果。

交往机会。同工人阶层相比,处于上层地位的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由于所接受的正规教育普遍较高、经历过较多的职业升迁,因此在学校、工作单位和社交等场合与家庭关系之外的各种非亲属打交道的机会较多,因此有更多的机会与各种非亲属讨论对他们而言的重要问题。这有可能使得其讨论网中包括更多的非亲属成员和非亲属关系种类。相对而言,工人阶层的教育获得是4个阶层中最低的,所经历的职业升迁或变动也是4个阶层中最少的,因此造成他/她们在学校或不同性质的工作单位等场所建立社会网络的机会较少。与各种非亲属交往机会的多寡是造成专业行政管理阶层讨论网中的非亲属规模和非亲属关系种类大于工人阶层的主要原因。

白领阶层、小雇主阶层与工人阶层在非亲属规模和非亲属关系种类上没有显著差别,一方面可能是他们面对着基本相同的社会交往机会与限制条件所致,另一方面可能与中国阶层结构分化的程度不足有关,主要体现在处于上层和下层的专业行政管理人員和工人阶层之间。

为什么各阶层之间在亲属网络规模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别呢?可能的解释是,在一个小规模的核心讨论网中,人们是否选择某人或某种角色关系作为社会网络的成员,取决于自我与该人的关系是否密切,以及对该人的信任程度,因为对自我而言重要的问题也许涉及到个人隐私。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家庭和亲属关系一直处在自我社会网络的中心(费孝通,1998/1949)。这个发现也印证了科尔曼(Coleman, 1990)所说的亲属社会网络的封闭性,有利于保证规范的维持和信任的巩固,从而使众多的家庭保持持久的团结力。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联结起来的亲属之间,存在一种强制推行的信任,为履行义务与实践期待提供了某种约束和保证。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我们的研究中各阶层之间在讨论网的亲属规模和亲属关系种类方面不存在意义重大的差别了。

关于阶层地位影响讨论网规模与关系种类的基本一致的研究发现,与网络规模与关系种类两个指标之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有关,^①虽然关系种类比网络规模所包含的信息更丰富。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在讨论网中所提出的关系种类(包括亲属种类和非亲属种类)较多,是他/她们较多的交往机会和较广的交往范围造成的。相反,工人阶层较少的关系种类,与后者的交往机会较少和交往范围狭小有关。

^① 网络规模与关系种类的 Pearson 相关系数高达 0.54($P < .01$, 双侧检验)。

在一个包括工具性、情感性和社交性功能的混合性讨论网中,前者以关系种类为标志的较丰富的社会资本为他/她们达成工具性目标提供了积极的条件。后者相对单一和贫乏的社会资本有可能使其在工具性行动中处于不利的境地。

(二)“结构洞”与交往频率

与此相关的研究发现是: 1.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讨论网中陌生成员的规模大于工人阶层。 2.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与网络成员每日交往的比例低于工人阶层。

一方面,交往机会较多、交往限制较少、交往范围较大的人的讨论网成员之间互不认识的比例较高。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网络成员中的陌生人规模大于工人阶层的结果,直接与前者比后者的讨论网规模更大的事实相关。另一方面,由于每个网络成员的自我社会角色不同,在与自我的沟通中可能发挥不同的作用。专业行政管理层和普通白领有可能与不同的人讨论不同的问题,而工人阶层则可能与某一、两个“关系密切”的亲友讨论所有的问题。比如对于专业行政管理层而言,他可能与同事研究与自己利益悠关的单位和壮大,与朋友一起休闲、参加社交活动,与亲属讨论情感问题、家庭事物。换言之,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讨论网中陌生成员规模大于工人阶层的事实,意味着前者在社会网络中占据着“结构洞”优势,无论对于传递有价值的信息、还是施加实质性的影响,无论对于情感性问题的解决,抑或工具性行动目标的实现来说,都比工人阶层处于更有利的位置。

至于工人阶层与网络成员的交往频率高于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可能与工人阶层讨论网中的亲属比例较高有关(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白领阶层、小雇主阶层和工人阶层的亲属比例分别为40.0%、40.7%、38.0%和42.3%)。较高的亲属比例意味着配偶、子女等核心家庭成员最有可能进入一个人的讨论网。在典型的核心中家庭中,多数家庭成员是居住在一起的,因此增加了每天见面和交往的机会。

(三)网络异质性

关于网络异质性,我们有如下4个发现: 1.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的性别异质性高于工人阶层。小雇主阶层与工人的性别异质性没有差别。 2.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年龄异质性高于工人阶层。白

领阶层、小雇主阶层与工人阶层的年龄异质性没有显著的区别。3. 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教育异质性比工人阶层低, 白领阶层比工人阶层的教育异质性高。小雇主阶层的教育异质性与工人阶层相比没有显著差别。4. 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白领阶层和小雇主阶层的职业异质性均高于工人阶层。

作为网络多元化的一个重要指标, 某个人或群体的异质性指数越高, 表示某个人或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是属于不同的社会圈子的。同时, 异质性指数越高, 标志着一个人或群体的社会资源越丰富, 特别是实现工具性目标时尤其明显。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的性别异质性高于工人阶层, 说明前者在选择网络成员时, 较少受到性别限制, 他们对网络成员的选择在性别方面更接近于样本的性别异质性指标。造成上述结果的直接原因与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白领阶层具有较多的交往机会和较广的交往圈子有关。一般而言, 在一个规模足够大的社会网络中, 成员之间的性别分布更接近于随机概率。工人阶层较低的性别异质性, 表明他/她们更可能将其讨论重要问题的对象囿于性别相同的群体之内。

年龄不仅表示人的生命周期的一个特定阶段,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指标, 因为年龄通常与工作年限、工作经验和资历正相关。因此年龄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特别在职业升迁、职业流动中重视资历的当代中国社会更为突出。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年龄异质性较高, 表明他们的讨论网成员中包括了各种社会地位和社会资历的人, 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该阶层社会交往的相对“开放”性。工人阶层较低的年龄异质性则意味着他们经常在自己的小圈子内讨论重要问题, 其社会网络相对“封闭”。

工人阶层的教育异质性高于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结果, 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 工人阶层期望与不同教育层次的人交往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或是达成自己的工具性目标。因为在当代中国社会, 拥有较高的正规教育学位是晋升上层阶层(比如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一个必备条件(Walder, 1995)。另一方面, 虽然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交往机会和交往多于工人阶层, 但是主要局限在拥有相同或类似教育水平的圈子内。在我们的样本中, 教育获得直接与阶层地位相关($\text{Eta} = .550, P < .001$), 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教育异质性较低, 也许说明了他们的交往有可能囿于本阶层的范围内。

同工人阶层相比,其他三个阶层的职业异质性均高于工人阶层。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白领阶层较高的职业异质性与他们较大的网络规模相关(二者的讨论网规模分别为 3.52 和 3.05)。在一个较大规模的社会网络中,自然可能包括从事各种职业的人。而较小的网络规模包括各种职业成员的可能性较小。但是平均网络规模小于工人阶层的小雇主阶层(二者的网络规模分别为 2.95 和 2.86),其职业异质性却比工人阶层高。可能的原因是,作为一个处在爬升阶段的新兴阶层,小雇主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相对较低,一方面通过结交各种职业地位的人特别是地位较高的政府官员、专业技术人士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希望与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控制者建立联系来发展和扩张自己的实业,达到自己的工具性目标。

(四)结论

阶层地位对以讨论网为主题的人们的社会网络资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阶层结构的两极: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总体网络规模及非亲属网络规模大于工人阶层,前者的关系种类及非亲属关系种类比后者更多元化。小雇主和工人阶层的总体网络规模和关系种类与工人阶级相比不存在显著的差别。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讨论网中“结构洞”数量多于工人阶层,专业行政管理和普通白领阶层与网络成员每日交往的比例低于工人阶层。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性别、年龄和职业异质性高于工人阶级。总之,占据优势地位的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比工人阶层拥有更丰富、更有价值的社会网络资本。

不可否认,中国社会在过去的 20 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等教育招生考试的重新恢复,不仅改变了许多青年学子的命运,也从国家政策的宏观角度发出了重视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信号。城市就业制度的逐步改革,促进了各阶级、阶层的分化和组合。劳动人事制度的不断完善,为人们在空间、职业、单位和行业之间的流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些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城市社会结构的解组、分化和重新整合。中国社会是否分化成界限明显的几个阶级或阶层,至少就我们的资料而言,这种分化还不十分明显。从社会网络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主要体现在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工人阶层两个极端。

我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理论和社会结构的机会与限

制理论对于中国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的结构特征提供了最好的解释,不同阶层的人们的网络结构差异主要是其所占据的社会位置所形成的交往机会或限制造成的,我们的结果证明地位较高的阶层拥有更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本。

参考文献:

- 边燕杰, 2004,《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 边燕杰、李焯, 2000,《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②
- 费孝通, 1998/1949,《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李沛良, 2001,《社会研究的统计应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陆学艺主编, 2002,《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阮丹青、周路、布劳、魏昂德, 1990《天津城市居民社会网初析》,《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熊瑞梅、黄毅志, 1992,《社会资源与小资本阶级》,《中国社会学刊》第16期。
- 张厚义, 2002,《私营企业主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张文宏、李沛良、阮丹青, 2004《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的阶层构成》,《社会学研究》第6期。
- Bian, Yanjie 2004, " Guanxi Capital and Social Eating in Chinese Cities: Theoretical Models and Empirical Analyses." in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 (eds.) by Nan Lin, Karen Cook & Ronald S. Burt.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 Blau, Peter M. & Danding Ruan 1990,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n Urban China and America." in A. Blau & Peter M. 1977, *Inequality and Heterogene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Burt, Ronald S. 1984, "Network Items and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 *Social Networks* 6.
- 1992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001, "Structural Holes Versus Network Closure as Social Capital." In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Research*.
- Burt, Ronald S. & W. R Scott(eds.) 1991, *Structures of Power and Constrai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leman James S. 1990 *The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 Goldthorpe, John H. 1987,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in *Collaboration With Catriona Llewellyn and Clive Payne*. (1980)2nd(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Fischer Claude S. 1982 *To Dwell Among Friends: Personal Networks in Town and C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ranovetter, Mark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 Kalleberg L. (ed.) 1988, *Research in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Vol 9. Greenwich: JAI Press.
- Laumann, Edward O. 1966, *Prestige and Association in an Urban Community*. Indianapolis: Bobbs-

Merrill.

- 1973, *Bonds of Pluralism: The Form and Substance of Urban Social Network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 Lin, Nan 1982, “Social Resources and Instrumental Action.” in Peter V. Marsden & Nan Lin (eds.),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Beverly Hills, CA: Sage.
- 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rsden, Peter V. 1987, “Core Discussion Networks of America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
- Ruan, Danching 1993, *Social Networks in Urban China*, Doctoral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 Scott, John 2000,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 Handbook* (2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
- Van der Poel, Mart G. M. 1993 *Personal Networks: A Ration-Choice Explanation of Their Size and Composition*. Swets & Zeitlinger B.V., Amsterdam/Lisse.
- Walder, Andrew G. 1995, “Career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st Political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 Wellman, Barry 1979, “The Community Question: The Intimate Networks of East Yorker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4.
- 1988, “Structural Analysis: from Method and Metaphor to Theory and Substance.” in *Social Structures A Network Approach*, (eds.) by Barry Wellman & S. D. Berkowitz.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right, Erik Olin 1978, *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 London: New Left.
- 1997, *Class Count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Class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单位: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高校社会学 E 研究院
责任编辑: 张宛丽

had thus turned a new twist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ound itself facing a new form of governance crisis. In response to this latest developmen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as stepping up its direct involvement in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in the countryside.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if properly implemented, the latest trend points to the direction whereby rural governance may be sustainable improved in the future.

The Effects of Social Class on Social Capital of Networks in Urban China

..... *Zhang Wenhong* 64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imed at exploring in what ways and to what extent class position affects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networ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lass analysis. Based on a large-scale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social networks in urban Beijing, this research analyzed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a random sample of 1,004 adult residents. Our central hypothesis is: social classes differ in ego-centered social capital of networks. The major findings are in three aspects: first, professionals and administrators (PAs) maintain relatively larger network size and more kinds of role relationship than working class people. Second, PAs and white collars have more prominent social capital of structural holes superior to working class. Third, compared with the workers, PAs have higher social heterogeneity in gender, age and occupation index. In conclusion, PAs have more abundant social capital of networks than workers. The above findings reveals the insufficient differentiation of class structure.

Society, Market and Values: Signs of the whole change—Second research on changes in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as seen from occupational prestige and job preferences

Xu Xinxin 82

Abstract: The paper reports ratings of occupational prestige and job preferences by rural and urban Chinese residents. Using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N=3183) aged above 18 and comparing with the former research, the author found that ratings of occupational prestige, job preferences and real mobility situations by Chinese residents reflected the deep changing process of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First, the differentiation of elite stratification leads to the change in Chinese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reorganiz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Second, changes in the opportunity structure of social mobility lead to stronger market preference increasingly.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people take entrepreneurs as an indicator of success. Thirdly, changes in cultural values are changing the whole Chinese social personality. All signs show that China has from a period of single economic change entered into a period of the whole change.

Reflects on the Timing View of Life-course Theory

Bao Leiping 120